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2.012

宋代的屠宰业与屠户收入水平探析

李珍珍

摘要: 屠宰业发展至宋代呈现出较明显的专业化趋势。肉食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逐渐分离,成为独立的行业。屠宰业结构产生较大变动,出现大量雇佣关系,牙人成为交易完成的重要见证人。宋代屠户群体内部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与其他行业相比,其收入水平并不算低。

关键词: 宋代; 屠宰业; 生产专业化; 收入水平

中图分类号: K244; F32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2-0100-06

收稿日期: 2023-10-23

作者简介: 李珍珍(1995—),女,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史, E-mail: lizhenzhen6662021@163.com。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形态发生重要变化,尤其是南宋,单一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巨大冲击,各行各业内部发生巨大变动。学界对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变定义为宋代进入了“富民社会”“帝制农商社会”或“农商社会”^①,虽说法不同,但其内涵基本相同。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减少,转而从事手工业、副业、商业等。农产品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加强,土地流转和社会阶层流动更加频繁,屠宰业便在此基础上逐渐走上专业化道路。目前学界对宋代单一产业的发展及其内部结构变化尚缺乏专门的论述,屠宰业更是鲜有论及^②。本文拟以宋代屠宰业的专业化、屠宰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为切入点,将宋代屠户的收入情况以及屠户与其他行业的收入作比较,管窥宋代“农商社会”之一斑。

一、宋代屠宰业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化

肉类生产与销售的专业化是宋代屠宰业发展的重要特征。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屠宰场有专门的供货来源即农村养殖户。销售的专业化主要是有专门的销售场地和销售渠道,屠宰场向肉铺供货的同时,还供货给酒店和餐饮行业。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出现,为屠宰业提供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和商机。

(一) 生产的专业化

两宋家畜饲养十分普遍,养殖专业户为屠宰业的兴盛提供稳定的来源。在都城近郊,一些养殖户可谓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例如家在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城东的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

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1]众多养殖户为城市屠宰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猪来源。常州无锡县(今江苏省无锡市)村民陈承信“本以贩豕为业,后极富”^{[2]56},其养殖规模可以想象。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屠者贾循“以货豕为业。常豢饲数十头,每夕宰其一”^{[2]218},是一个以饲养野味并卖肉的养殖户兼职屠户,其生产活动与市场的联系十分密切。湖北也有养猪专业户,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民某氏“世以圈豕为业。有村侩居五十里外,每为勾贩往来,积有年矣”^{[2]209},世代以养猪为业,数十年间与家住五十里之外的猪牙人交易频繁。

北宋时期东京城内人口已超过一百万,如此规模的人口对肉食品的需求量十分可观。市场需求反推产业结构升级,衍生出一系列专门为城市消费服务的配套措施。例如,在京城内部有专门屠宰场:“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辄百数。”^{[3]29}京城内的生猪、羊专由杀猪羊作坊提供;甚至还有专有的城门作为生猪进城的通道:外城的南薰门“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3]126-127},每日竟有数以万计的生猪经过。南宋时期“临安宰猪,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竟,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3]291}。大屠长为保证足量的供应,每日五更便开始劳作。

(二) 销售的专业化

销售的专业化主要表现在城市内设有专门的交易场所。北宋东京称为“肉行”:“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生熟肉从便索唤,阔切、片批、细抹、顿刀之类。至晚即有爨爆熟食上市。”^{[3]145}南宋杭州称为“肉铺”:“杭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皆装饰肉案,动器新丽。”^{[4]372}专业交易场所的出现,为居民提供极大便利。起初,政府为方便管理和税收专门设立了“行”:“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名,不以此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5]7}南宋时期临安有“青器行、处布行、抹布行、青果行、海鲜行、纸扇行、麻线行、蟹行、鱼行”^[6]等,多达四百四十行。海鲜行、蟹行、鱼行等均属于屠宰业的行会,其设置是市场秩序规范的重要体现,有利于稳定商业环境。

城市市场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村镇市场则面向远离城市的群体。村镇市场的兴起为屠宰业的发展提供了又一平台,可谓是占据地理优势,更加方便农民将农产品出售到市场上,同时也方便农民到市场上采购所需的其他生产生活资料。余干(今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古步“有墟市数百家,为商贾往来通道,屠宰者甚众”^{[2]468}。秀州(今属浙江省嘉兴市)青龙镇,“凡百筵会,必取杀牛肉,取巧庖馔,恣啖为乐”^[7]。每逢节日,便杀牛设宴庆祝。村镇市场的兴起是农商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农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村镇市场是连接城市和乡村的纽带,村镇市场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极大便利,使得农村居民有机会享受部分城市资源,又为城市近郊居民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广阔的生活空间。

二、宋代屠宰业内部结构变动与收入差距的扩大

两宋时期,屠宰行业内部经历巨大变动,有较为明显的农商社会特质,主要表现在雇佣关系与中间人撮合交易、行业分工逐渐细化、群体收入差距扩大等方面。雇佣关系的出现被学界认为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两宋时期诸多行业均出现了雇工。

(一) 宋代屠宰业内部结构的变动

1. 雇佣关系与中间人的存在

雇佣关系广泛存在于各个行业之中,屠宰业这一相对边缘化的产业也不例外。京城内的大型屠宰场

仅仅依靠小家庭成员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必须从市场上用特殊手段获得劳动力,即雇佣工人。在屠宰业内部,雇佣工人的现象十分普遍。南宋时期杭州的肉铺,每逢冬至、春节,要向市场上输送大量肉类,这一环节需要雇佣工人的参与:“如冬、年两节,各铺日卖数十边,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顾从使索唤剉切。”^{[4]372}很多肉铺需要雇佣帮工来维持日常的经营,足见其产业规模庞大,模式先进。

在牲畜交易过程中,牙人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中间人,牙人能够促使双方完成交易。宋高宗时期“浙江卖羊官圈都牙人”杨康“乞每岁献纳卖羊抽牙分利钱二万三千缗,应办太庙、景灵宫大小酌献支用,并买献内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计钱一万缗。”但条件是“其他牙人不得在圈作弊。”官员上言:“杨康以市井狙(佞),辄敢进状,欲专一府屠宰之利,使其侪辈拱手失业。”^[8]杨康遂被送大理丞治罪。在实际交易时,交易双方约定好给牙人一定的财物作为撮合生意的报酬。牙人能够根据牲畜的毛色、体型、健康状况等诸多特征,进行价值估算,然后再与买卖双方议定价格。牙人的另一重要作用便是担保,即在交易时双方订立契约,牙人作为见证人,对后续问题负责。如有任何一方违约失信或质量无法保证,牙人负有连带责任,需承担相应的风险。这种订立契约的交易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的交换,在当时各项监督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下,契约便是最好的凭证。

2. 行业分工逐渐细化

屠宰业内部分工逐渐细化,主要表现为生产与销售、加工逐渐分离,各个环节均有专门的从业人员。两宋时期屠宰业生产与销售均有专门固定的场所,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一批专门从事肉食品加工的从业者:“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2]78-79}又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细民萧七“居于双碑下,能批炙猪肉片脯行贾,以取分毫之利,贍育妻子”^{[2]347}。东京城里有专门很多专门卖熟食的店铺:“又有肥羊酒店,如丰豫门归家,省马院前莫家,后市街口施家,马婆巷双羊店等铺,零卖软羊,大骨龟背,烂蒸大片,羊杂烩四软,羊撵四件。”^{[4]363-364}汧阳县(今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的猪肉产生了名牌效应:“闻汧阳猪肉至美,遣人至之。”^[9]引得苏轼慕名而来。肉食品从养殖到加工,到销售再到可食用,中间要经过诸多环节,屠宰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屠户不仅要保证原材料安全,还要保证肉食品的新鲜,在当时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是一项极为严峻的挑战。

(三) 群体内部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屠户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过大且极为明显。有的屠户能够及时抓住机遇,升级产业结构,扩大再生产。有些屠户只能日复一日经营小本买卖,维持基本生计。一般来说,屠户的生产经营规模越大,其收入水平越高;经营规模和范围越小,其再生产的能力越低,总体收入就越低。宋代屠户群体内部的收入水平悬殊,善于经营的屠户能够积累大量资产,极大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一跃进入富民阶层;墨守成规的屠户经营规模固定,仅能够维持生计。根据屠户的整体收入状况,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三个等级。

1. 高收入群体

宋代存在一些收入水平较高的屠户,他们能够依靠屠宰技术发家致富。河北恩州(今河北省清河)居民“张氏以屠牛致富”^{[2]358},余干县(今江西余干)王屠户“积货不胜数,至于买田作室”^{[2]468},寿春县(今安徽省淮南)“屠者郑就,家至贫……踰年遂富”^[9]。他们有充足的资金扩大生产,甚至有富余的资金买田作室。南宋时期临安城内甚至有专门负责协调城市内肉食品市场的大屠户:“临安宰猪,但一大屠为之长,每五鼓击杀于作坊,须割裂既竟,然后众屠儿分挈以去。”^{[2]291}大屠长的经济基础应十分雄厚。

此外,牛屠户应是所有类型的屠户中收入水平最高的,《宋会要辑稿》中有关于屠牛利润的记载:“伏见无知之民,日以屠牛取利者,所在有之,比年朝廷虽增严法度,然亦未能止绝。盖一牛之价不过五七千,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肉每斤价值需百钱,利入厚故,人多贪利,不顾重刑。”^[10]大观年间,每头活牛价格在5 000—7 000文之间,1头牛可杀出200—300斤牛肉,每斤牛肉价格在100文左右,按平均数计算,则每头牛可卖25 000文钱,较活牛所得价钱4倍还多。此外,牛的皮、筋、角又可以卖1 500文左右,除去买入成本,一头牛可得20 500文左右,如此高额的利润吸引大量屠户趋之若鹜。

2. 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水平的屠户占绝大多数,这类屠户大多世代经营,虽没有大富大贵,但能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人童七“累世以刺豕为业,每岁不啻千数,又转贩于城市中,专用于肥其家。”^{[12]247}假设每年宰杀1 000头,平均到日则是每日宰杀2.73头。每头猪大致可以宰杀出140—160斤左右的猪肉可供销售,按150斤计算,则每日可得409.5斤生肉。据《繁盛录》记载,南宋临安的猪肉价格每斤九十省文,则该屠户每日的收入为36 855(省文)。又绍兴中台州伦居县有园人陈甲养一猪“特货于张屠,正得钱千二百”^{[12]239},三头猪成本在3 600文左右。抛开成本及物价等诸多因素来看,该屠户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农民经营农业所得。

鄱阳(今江西鄱阳县)石门“屠者羊六,以宰羊为生累世矣”^{[12]474}。盐官(今浙江海宁市)黄天荡“余三乙,世以屠狗为业”^{[12]38}。饶州乐平县(今江西省景德镇市)“白石村民董白额者,以佻牛为业,所杀不胜纪”^{[12]140}。董白额虽是个牛牙人,但杀牛无法计数,说明其日常也经营屠宰,且生意兴隆。婺源(今江西婺源)村民毕应“专意屠牛,每与人夸说,所杀至千头矣”^{[12]346}。以上诸多屠户的收入水平虽不算太高,但也能够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在中间水平。

3. 低收入群体

一些经营规模较小的屠户甚至面临破产。临川(今江西抚州)“屠者张某,晚年颇悔其业……其家素贫”^{[11]170-171},直到晚年家里还十分贫困。“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12]135},其收入自然不能与那些大屠户相提并论。很多屠户连开设店铺的本钱都没有,只能用扁担担肉流动经营。南宋时期,遭乱南徙的屠户张二被问“何以不作区肆,而行贾仆仆”时,只能回答:“非不能之,但赤手乏本耳。”^{[12]79}想要在城市内经商也并非易事。宋政府为加强市场管理,在城市内还设有专门的“行”。“行”的设置对那些经济基础薄弱的商贩来说是一种负担:“京师供百物有行,虽与外州军等,而官司上下须索,无虑十倍以上,凡诸行陪纳猥多,而赍操输送之费复不在是。下逮稗贩、贫民,亦多以故失职。”^{[13]5935}大量小商贩因此破产。这些低收入群体面临着随时破产的风险,生活水平无法保障。

诚然,每个行业的收入均有高下之分,这与经营主体的企业规模、经营状况、技术水平、地区和城市规模等诸多因素息息相关。一般而言,大型屠宰场占有更多的市场资源和区位优势,例如上述提及的杭州城内拥有开阖敛散之权的大屠长,其占尽地理位置的优势,能够在杭州城内拥有一定产业规模,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再者,存在技术水平的差距。相比较而言,宰牛比杀鸡更考验技术水平,因此屠牛专业户普遍比杀鸡户更容易获得优势。农村市场规模略显不足,农村屠户的收入会略低。

三、宋代屠宰行业整体收入水平与其他行业之比较

纵观整个宋代,屠宰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并不算低。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的急剧增加,市场对肉类的需求越来越大,屠宰业飞速发展。宋代屠宰业内部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尽管如此,其整体收入水平在宋代是略高于其他行业的。

先了解宋代底层人民每日大致的收入。《夷坚志》记载,黄州茶铺每月给店伙计工钱不过1000文^{[21]119},平均每日30文,算上吃住不过50文。霍有光曾统计过元丰四年(1081)役夫的收入水平,均州、邓州三万人为鄜州、延州运输军用物资时“日支米钱三十,柴菜钱十,并先并给”^{[13]7720},陕西都转运司从诸州差雇车乘人夫“人日支米二升、钱五十”^{[13]7852}。元丰七年(1084)诏:“鄜延、环庆路如有合兴工城寨,许和雇人,日支钱百、米二升,禁军愿就雇者听。”^{[13]8235}不排除有些役夫工价较高,如元祐元年(1086)“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涉,沮隔官私舟船……民间每日雇夫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得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13]8939}。根据当日米均价80钱一斗,二升米价值20钱,工价较低的役夫每日最多40文钱,工价较高的役夫每日最多200文。“100文及数十文是乡村下层百姓普遍的每天收入。不过一般家庭不会只有一人有工作挣钱的能力,所以一般会高于100文”^[14]。这有史料佐证。“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15];沧州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11]144}。可见底层民众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想要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每人每日最低需要20文,又根据宋代基本上属于五口之家,因此日收入100文是最低保障,仅满足一天饮食所需,其他发展性消费、娱乐性消费基本无从谈起。

再看宋代低收入屠户的日收入。都下马吉“每杀一鸡,得佣钱十文,日有数百钱”^{[12]135}。这是一条比较典型的材料,可以直观地看到此类屠户大致每日收入有几百文,显然高于其他从业人员的收入。“饶州细民萧七,居于双碑下,能批炙猪肉片脯行贾,以取分毫之利,贍育妻子”^{[2]347}。萧七每日所得利润不多,但足够贍养妻子儿女。根据卖肉屠户的收入水平可以推断,他们的收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是不成问题的。

总体而言,宋代屠户的收入水平不算低,但其群体内部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大规模经营的屠户能够积累资产,发家致富,小规模经营的商贩则经营相对困难甚至面临破产。总体而言,与其他普通群体相比,屠户的收入水平算是比较高的,至少能够获得与自身付出价值相匹配的回报。

四、结语

首先,宋代屠宰业发展逐渐呈现出专业化趋势,其主要表现是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化。其次,屠宰业群体内部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其主要受生产规模、屠宰技术、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最后,尽管屠宰业内部收入差距较大,但宋代屠户整体收入水平不算低,甚至高于其他行业。

宋代屠宰业的发展与屠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至一个新阶段,农产品商品化是其必然趋势。农商社会极大发展,使得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从事其他行业。屠宰业与其他行业的专业化同时进行,并相互促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增加,又为屠宰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促使屠宰业飞速发展;市镇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屠宰业提供交易平台,屠宰业俨然是农商社会的重要代表。总之,在农商社会视域下,宋代屠宰业专业化程度大幅度提升,分工更加细化,

区域性特征更加明显。屠宰业的兴盛极大满足了时人的消费需求,对提高宋人的生活质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屠宰业作为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产业,宋代屠宰业在如此尴尬境地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可见其内部能量十分强大。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屠户群体均广泛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宋代屠宰业的发展不仅仅代表屠宰业这一单一产业的进步,更是其他各行各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注释:

- ① 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赵轶峰《明代中国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宋以降(11-12)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② 杨计国、冯晨晨《宋代屠牛食牛的社会原因考察》(《平顶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对宋代宰杀耕牛、食用牛肉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考察,但未涉及宋代屠宰业的发展等情况。

参考文献:

- [1] 何遂.春渚纪闻[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03.
- [2] 洪迈.夷坚志[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3]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4] 吴自牧.梦粱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5] 耐德翁.都城纪胜[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6] 西湖老人.繁盛录[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123.
- [7] 佚名.湖海新闻夷坚续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97.
- [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8:2840.
- [9]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0
- [10] 徐松.宋会要辑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07.
- [11] 郭象.睽车志[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2] 刘斧.青锁高议[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 [1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4] 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1:433.
- [15] 张耒.张耒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230.

Analysis of the Slaughtering Industry and the Butcher's Income Level in the Song Dynasty Society

LI Zhenzhe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laughtering industry till the Song Dynasty gradually showed a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selling of meat food were gradually divided and developed into separate industries. The structure of slaughtering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greatly, and large-scale employment emerged, with brokers ending up witnesses to the end-point meat trade. Though there was a gradually enlarged income gap between butchers in their industry, the income level of butchers is not low compared to those in other industries.

Keywords: Song dynasty; slaughtering industry; production specialization; income level